



# “一带一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筑梦之路”\*

张三元

**摘要：**“一带一路”既承载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历史使命，也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与梦想，它是中国梦价值内涵的现实延伸，是将中国梦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联结起来的桥梁。中国文化只有走出去，才可能在不断壮大自身的同时不断增强其国际影响力，从而展示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的相通与相济，更好地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走出去即国际传播，亦即“文化外推”。“一带一路”既是一条经济交流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互鉴之路。“一带一路”承载并传播着中国文化的当代价值理想，不断开拓文化空间生产，体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统一。文化强国不仅意味着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意味着中国文化跨文化传播的有效展开。只有通过跨文化传播，使中国文化在多元文化中实现全球性建构，才能为中国梦的实现创造和谐共生的国际环境并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国文化；文化外推；国际传播；筑梦之路

**中图分类号：**G03；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4)02-0050-08

在借鉴丝绸之路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成果丰硕。“一带一路”既承载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历史使命，也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与梦想。因而，“一带一路”是中国梦价值内涵的现实延伸，是将中国梦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联结起来的桥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中国梦的世界版，是中国梦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联结的融通。中国梦是中国文化的充分彰显和具体体现，因而“一带一路”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筑梦之路”。一方面，“一带一路”必须以中国文化走出去为前提条件，“一带一路”既是中国文化的现实载体，又以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为基础；另一方面，“和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价值理念，其价值取向是通过“和而不同”“协和万邦”以达到“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中国文化从来不谋求一己之私利，而是胸怀天下为公、道洽大同的至善理想。两者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展示出“一带一路”的基本向度：中国文化价值观的世界性呈现。

## 一、“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和文化外推

赵汀阳提出了一个“天下体系”的构想，招致了一些非议。这是很自然的。任何一种以西化中或以中化西而构建起来的“天下体系”，都不可避免地落入空想或假设之窠臼。尽管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存在着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其所提供的思维方式却是有价值的：“从天下去理

收稿日期：2023-08-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逻辑研究”(22BKS069)。

作者简介：张三元，男，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430223)，主要从事唯物史观与当代中国文化基本问题、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等研究。

解世界,就是以整个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从而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的思维。”<sup>[1]</sup>因而,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理想在根本上是相契合的。实际上,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正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因此,与其说赵汀阳的“天下体系”是一种“先驱性”洞见<sup>①</sup>,不如说它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抽离出来并加以改变、仍需不断深化与完善的理论课题。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天下观并不是一个国家民族概念,而是一个文化影响力概念”<sup>[2]304-305</sup>,即采取“怀柔远人”乃至怀柔天下的政策,通过自己文化的影响力“协和万邦”“化成天下”,实现“天下大同”的共同社会理想。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文化的价值目标。

中国文化以大同为理想。大同理想第一次“壮丽日出”是在《礼记》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sup>[3]</sup>大同社会是以当时人们所能认识到的“天下”而言的,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疆域,因而具有极大的开放性。这个大同理想被老子和孔子所推崇,因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想。

及至近代,“天下”已不再是原先之“天下”,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他者”,且被一些“他者”肆意践踏与蹂躏,但大同理想一直未曾泯灭。面对李鸿章所言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康有为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西方的政治理想结合起来,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大同社会,揭示了人类社会由“据乱”进为“升平”(小康),并进而实现“太平”(大同)的必然规律,认为“至平”“至公”“至仁”的“大同之道”是人类社会的必然归宿<sup>②</sup>。尽管这种“大同之道”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们没有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道路,因而它只是一种空想。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亦奉“大同”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理想,在其“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既是落脚点,也是终极目标,而“民生主义”的终极目标,正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

同世界”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大同主义”。后来“大同主义”吸收了马克思主义营养,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成分<sup>③</sup>,但其主要思想资源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在孙中山看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奉行王道,后者追求霸道。这是两条性质完全不同的道路:王道主张仁义道德、公平正义,霸道则以功利强权为目的,以势欺人、以权压人、以暴力征服人。王道的核心要义是“和”理念,体现了“世界主义的真精神”<sup>④</sup>。这既客观地展陈了中国文化和平发展、追求大同的基因,也揭示了中国文化的一次重大转变,无疑对于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提供了更深层次的价值引导。这个转变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表明经过漫长的艰苦探索,中国社会开始走上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自强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王道。王道以“仁”为核心,是平等、和平、合作、共赢之道。显然,王道是一种理想的天下主义模式,是实现“大同”理想的必由之路,而霸道是现实的帝国主义模式,是导致世界战乱频仍、灾难不断的根源。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不以王道为基的霸道是不符合人性的,因而不可能持久,霸权主义的命运只有一个:失败。当今世界,尽管霸权主义盛行、霸凌行径猖獗,单边主义肆无忌惮,但追求平等、合作、共赢是不可违逆的时代潮流,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国强必霸”的零和思维不符合这个潮流。在风险不断加剧、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的历史条件下,十分肯定的是,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的“霸道”走不通,是死路一条。只有和平发展道路,才是通达大同理想的“王道”,尽管前路坎坷曲折,但前途光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遏止。因此,重建“天下主义”,真正做到“以天下观天下”,坚守和平发展的“王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要义。这就是管子的“创制天下”(《管子·霸言》),也是孟子“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的理想,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天下一体之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天下一体之仁”在当代的具体实践<sup>[2]337-341</sup>。

“大同”这个古老的社会文化信念,随着中国历史发展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拓展而被赋予崭新的时代内涵,展现出勃勃生机,体现了中国

文化的远大理想。“大同”不仅是一种社会政治理想,更是一种“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价值理念,是“以天下观天下”的正确态度。当然,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社会政治理想与人们的价值理念总是交会融合的,没有脱离价值基础的社会政治理想,也没有脱离社会政治理念的单纯的个人价值理想。因此,“大同”即是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需要强调的是,“大同”与“小人同而不和”之“小同”有着本质的区别。“小同”强调无差别的一致,而“大同”则是“和而不同”。这是理解中国文化“大同”理想的关键所在。在社会层面,每个人都是独立而特殊的个体,只有尊重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达到“和”——形成最低限度的共识和目标,在彼此协作和相互促进中实现每一个人的利益诉求,才能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在国际社会层面,文化价值观的多样性决定了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彼此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合作共赢是实现世界和平发展的“王道”。“丝路精神”正是“王道”的具体展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大同”为核心价值的“中国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sup>[4]352</sup>。

那么,如何实现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或者说,中国文化如何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从而“协和万邦”“化成天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呢?答案很明确,即中国文化在创新发展的基础上走出去,在借鉴吸收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只有走出去,才可能体现中国文化感召力,在中国文化不断壮大自身的同时,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从而展示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的相通与相济,更好地促进人类文明发展。实际上,走出去即跨文化传播,即“文化外推”。

“文化外推”是沈清松从“跨文化哲学”角度提出的一个概念。“文化外推”是对文化走出去策略的一个形象生动的哲学阐释。“文化外推”就是文化传播或文化传布,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跨文化传播,“指的是在不同文化脉络中产生的观念、价值与产品及其传统,经由适当的传输方法,在另一异文化脉络中获得新的生命”<sup>[5]</sup>。这种理解将“文化外推”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沈清松认为,“文化外推”是跨文化互动中最起码

的要求。既然“文化外推”是跨文化传播的意思,那么,这里为什么要提起“文化外推”这一概念呢?“文化外推”这一概念起码可以给我们以两个方面的启迪:其一,“文化外推”是相对于“文化传衍”而言的。“文化传衍”主要是指同一文化内部的文化流传与散布,而“文化外推”则主要是指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传输与扩散。如果说前者是一个由浅入深、由点到面的大众化过程,那么,后者则是一种突破壁垒、超越自我、走向多元,从熟悉走向陌生的活动。显然,在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尽管“文化外推”也时有存在,但“文化传衍”是主流。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繁荣却对其他文化影响力稍显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二,“文化外推”并不是单向的输出,而是相互外推的过程,是一种文化在不同文化中获得新的生命。中国文化走出去,要把自己的文化理想传播出去,更重要的是在不同文化中获得新的生命。

## 二、“一带一路”的文化维度及其文化空间生产

“一带一路”既是一条经济交流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人们在谈到“一带一路”时总是强调经济带,把经济放在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这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必须看到,经济的交流与合作必须以沿线国家和人民对“一带一路”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解上的共同性、相似性和情感上的契合性为基础。也就是说,“一带一路”蕴含着深刻的文化维度。与“一带一路”的经济维度相比,文化维度具有最深刻、最本质的意义。没有文化的浸润与化成,经济的“一带一路”不可能建成,更不可能持久。没有文化上的认同和情感上的契合,就不可能有经济合作、政治合作。所以,建设“一带一路”,本质上是建设一条文化相通融合之路,建设一条中国文化价值观走出去的“筑梦之路”。

首先,“一带一路”承载着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一带一路”承载着中国文化“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当代价值理想——实现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统一。在表面上,中国梦是中国人民的梦,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是全人类共同的理想与归宿,但在本质上,两者是完全一致的。这个一致性主要表现为两者都根植于中国文化之中,是中国价值理想的集中呈现:“天下一家”“协和万邦”,追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实现“天下大同”。这个根本价值取向,通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体现出来,呈现出一个以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指归的美好世界。追求人民幸福和人类解放,实现和衷共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中国文化的本质要求。中国梦在实现中国人民美好生活的同时,也以人类文明进步为奋斗目标,因而也是人类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方略和具体道路,“一带一路”构成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实践平台。这就决定了“一带一路”建设的价值选择只能是:“坚持各国共商、共建、共享,遵循平等、追求互利,牢牢把握重点方向,聚焦重点地区、重点国家、重点项目,抓住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不仅造福中国人民,更造福沿线各国人民。”<sup>[4]504</sup>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和而不同”或“不同之和”为原则,“一带一路”建设也必须秉持这个价值原则。“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的大智慧,是中国价值的核心底蕴。“一带一路”横贯亚非欧,向全世界辐射,涉及的语言达两千余种之多,因此,“一带一路”倡导的“和而不同”主要表现为文化的“不同之和”,或如有学者所讲的“文化自觉之和”<sup>④</sup>。要达到多样性文化的“不同之和”或“文化自觉之和”,确实需要每个个体对自身文化有清醒的认知,并努力保持这种文化的独特性。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文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只有这样,不同文化之间才能相互尊重、互惠往来。“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一带一路”只能由不同文化之“和”铸就,而这种“和”正是中国文化的终极价值追求。

其次,“一带一路”传播着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一带一路”通向哪里,就把中国文化及其价值观带到哪里,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质性内涵,亦即人们所讲的“一带一路”的文化维度。实际上,由于“一带一路”是中国文化价值理想的承载者,因而,“一带一路”建设本身就是传播中

国文化价值理想。但在严格的意义上,“一带一路”及其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向需要得到有效阐释。我们既要做,又要讲清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截至目前,“一带一路”建设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一项一项的政策、措施和项目纷纷落地,但我们面临的一个客观现实却是,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依然需要面对诸多困难与挑战,“一带一路”承担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史使命是极其艰巨的。

有学者认为,文化是“一带一路”的基本维度,具体表现为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提升或扩大文化的影响力、辐射力、凝聚力、感召力,因此,它不仅是指在一定的文化空间中进行文化的生产,还要求实现主流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有效外在投射以及中国文化获得普遍性的价值认可,从而充分彰显“一带一路”的文化使命<sup>⑤</sup>。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价值“外推”具有关键性意义。中国价值“外推”是推动中国价值走出自我封闭、走向多元文化、从熟悉走向陌生,并进而在不同文化中获得新的生命。一方面,“一带一路”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文化的凝结,也是中国价值的具体展开,是中国价值形象的生动展现。因而,“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象,实际上是中国价值形象,是中国价值的具体化、形象性和生动化。另一方面,中国价值是从中国文化传统中走出来、在当代中国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既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形象,更展现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立体形象,因而既构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硬核”,也构成中国道路的显著标识。因此,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有效投射和中国道路正确性的有效阐释,都离不开中国价值合理的、有效的传播。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建设中文化品牌的塑造,实际上是中国价值形象的塑造,是中国价值的彰显。

最后,“一带一路”拓展着中国文化的空间生产。空间生产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列斐伏尔基于马克思的生产实践理论创立的。通过对现代生产方式的分析,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生产已由“空间中的生产”转向“空间的生产”,这种转向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次根本性转变,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

和历史的发展机制。“空间”并非一种物理空间或地理空间,而是物理空间或地理空间在意义上的拓展。尽管物理空间或地理空间仍然是社会过程的起源,对于人类实践和国家主权而言具有绝对性,但在此基础上,一种象征想象的、符号化的、意义化的空间已经被生产出来,成为人类生存、生活的新空间。在唯物史观看来,与物理空间或地理空间不同,空间生产的空间不是自然的产物,也不是“造物主”的创造,而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当然,空间不是单一的结构,而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是集物质性、精神性、社会性于一体的空间结构。在此基础上,人们对美学、文学、艺术、文化等进行不断整合与重构,构建起用以表征实践的文化空间。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空间生产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空间生产。人们经常用“场所”“场域”“地区”“地方”“文化景观”等概念概括文化空间。文化空间主要由地理环境、实践内容与价值呈现等因素组成,其中,人当然是唯一的主体,是决定性的,而价值则表现为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等。人的实践内容作用于环境等因素,蕴含并彰显出特定的价值与意义,从而呈现出一定的文化空间。当然,文化空间是人的文化空间,因而对人的活动内容与活动方式产生影响,并进而重构人际交往及其社会关系,重塑现实的生活空间。

“一带一路”不仅开拓物的空间生产,也开拓文化空间生产。当然,两者不是截然分立、泾渭分明的,而是相互重叠、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文化产品既承担文化的责任和使命,又以物的形式呈现出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任何一件商品都应该是文化产品,而不能是纯粹的商品。因此,“一带一路”拓展中国文化的空间生产,起码有三个具体的表现:其一,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空间得以拓展。“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是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和谐共生的过程。在过往的历史中,由于空间阻隔——在物理空间和历史空间的双重制约下,文化交流的空间有限,文化互通只能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一带一路”建设则使不同文化突破了自然空间和历史空间的双重制约,文化空间生产呈现出鲜明的实践特性,给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种空间既

是物质空间,更是体验性空间或符号性空间。其二,“一带一路”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以价值共识为基础,因而既带来了不同文化及其价值的异质趋同,扩大共识,也造成了多样性文化价值的凸显,“和而不同”促使不同文化的融通,从而生产出不同文化共同的生产空间。其三,“一带一路”为“文化外推”提供了历史性契机,而“文化外推”既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走向他者、走向陌生,也使中国文化走向未来,在多元文化脉络中获得新的生命,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迸发出更大的正能量。

### 三、“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与中国梦的全球性建构

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是实现中国梦的“三个必须”<sup>[6]39-40</sup>,不能有丝毫的动摇,这深刻地展示了中国梦的文化维度。同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了文化强国的目标,表明了文化强国和中国梦具有内在统一性。文化强国与之后提出的科技强国、教育强国等一样,是实现中国梦的现实途径。作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支撑,文化强国不仅意味着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意味着中国文化跨文化传播的有效展开。由于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贯通,因而,只有通过跨文化传播,使中国文化在多元文化中实现全球性建构,才能为中国梦的实现创造和谐共生的国际环境并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中国文化的全球性建构和中国梦的全球性建构实质上是同一个历史过程,而“一带一路”正是实现这种全球性建构的筑梦之路。

文化强国既是一个目标,也是一种路径。作为目标,文化强国是通过文化创造、传播来实现的;作为路径,文化建设是强国的基本方式。在这里,主要指后者。中国梦是文化强国之梦,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世界性提升。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强国是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持续提升。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由小变大、由弱转强的历史进程,都是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的结果,既包括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的持续提升,

也包括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等软实力的持续提升,而且后者更具关键性意义。没有文化软实力的强大支撑,即使国力一时确实强大,也只是昙花一现。同样,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综合国力持续提升的结果与表征,是由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形成的合力造成的。显然,在这个合力当中,文化至关重要,它既是政治、经济、科技等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政治、经济、科技与社会的“黏合剂”。没有文化的调节,就可能出现政治与经济、科技与军事的断裂,从而制约社会的发展。因此,实现中国梦包含着文化强国的要求,文化强国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维度,甚至是本质维度。有学者指出,文化强国是一种战略精神,是依循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性格和对社会文明进程所实践的行动,也是在破除愚昧浮躁观念态势下建立起的新秩序<sup>⑥</sup>。由此可见,文化强国与“强权必霸”的逻辑截然不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梦。

“一带一路”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现实道路。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全新时代内涵的“丝路精神”正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彰显,也是我们应对全球化传播应该秉持的价值理念。全球化传播是大势所趋,既是全球化的结果,也是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助推力。全球化是不可遏止的时代潮流,而全球化传播则构成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时代特征,因而也是不可逆转的。任何一种文化,只有顺应这个时代潮流,善于借鉴、吸收不同文化中的有益养分,才能在不同文化中获得新的生命,在推动自身繁荣发展的同时,给多元文化的繁荣发展创造条件,否则,就会不断地被挤压、被边缘化,甚至被同化或被消灭。“一带一路”建设给中国文化与沿线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借鉴、融合创造了条件,从而给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作为“丝路精神”的当代拓展,“一带一路”在打造层级丰富的经济之路的同时,也在打造一条开放包容的文化通道,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科技文化等有机融合起来,确立彼此尊重、平等互惠、合作共赢的交往模式,既借鉴、吸收沿线各国文化的有益成分,也传递着“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天下

情怀。因此,“一带一路”建设既是新的文化复兴之旅,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中国梦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出来的,虽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但却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其实现具有鲜明的世界性特征。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屡遭西方列强的践踏、蹂躏,山河破碎、苦难深重,中国人民于落后挨打中奋起,救亡图存、浴血奋斗,挽狂澜于既倒,作出的牺牲世所罕见。“回首过去,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sup>[6]36</sup>这正是中国梦提出的缘由与初衷。这个初衷,显然具有全球性视野。正因如此,中国梦不仅展现了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伟大理想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奋斗,其伟大实践又昭示着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呈现出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基本逻辑,具有文明观念变革的世界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建设,必须继承和发扬“丝路精神”。当然,在今天,“丝路精神”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给沿线各国人民带来了丰裕的商品和多彩的文化,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我们有理由相信,通向未来的“一带一路”,将是一条抵达美好生活的现实道路:中国梦和沿线各国人民的梦相通,助力各国人民实现自己的梦想。因此,“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梦全球性构建的重要实践平台。

一方面,秉承“推己及人”“达己达人”的价值理念,“一带一路”既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筑梦之路,也是造福世界人民的大同之路。

价值观是梦的核心支撑。价值观不同,梦的色彩也就各异。中国价值铸造中国梦,中国梦体现中国价值;中国价值以中国梦为具体表现,中国梦以中国价值为核心内容。因此,中国价值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与方向指引,中国价值构成实现中国梦最坚实的文化软实力基础。中国价值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了个人前途与共同利益的高度统一。这个共同利益,既包括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利益,也包括人类共同体的利益,是民族共同利益、国家共同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统一。中国价值既体现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利益,也体现了人类共同利益,是家国情怀和天下情怀、民族情怀和人类

情怀的统一,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视为一个休戚与共、福祸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就此而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等于中国梦,但却是构成中国梦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是中国梦的世界版或人类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必然走向。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被写入党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特别强调了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重大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拓展擘画了新蓝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必然走向。毫无疑问,这一重大举措彰显出中华民族超越自身利益而贡献于世界的天下情怀,彰显中国人民“协和万邦”、追求“天下大同”的价值理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家国情怀和人类情怀、民族精神与国际视野的高度统一。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家国情怀和天下情怀融为一体:“‘一带一路’建设不应仅仅着眼于我国自身发展,而是要以我国发展为契机,让更多国家搭上我国发展‘快车’,帮助他们实现发展目标。我们要在发展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多考虑和照顾其他国家利益。”<sup>[4]501</sup>由此可见,中国梦是以人类的整体利益为视域,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目标,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全球视野。

另一方面,在任何时候,中华民族共同体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共同体构成共生共荣、福祸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凸显并加强了这种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不是心血来潮、灵光一闪,而是基于这一基本事实,基于中华民族在全球化中的现实境遇提出来的。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了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广阔视域,否则,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能独自应对各种生存性危机而独善其身。中国梦虽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民族梦、国家梦,但它绝不是一个违背世界历史规律、超越全球化的抽象存在。因而,我们既要考察中国梦之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世界性意义,也要考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中,中国梦作为中国发展战略的实现问题,即从世界历史的现实逻辑

视角回答如何在全球化境遇中实现中国梦。一个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是,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不可能孤立地进行,而必须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互推甚至互融,通过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价值理念,走和平发展道路,与世界各民族、国家一道实现稳定发展和进步。

在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实现两者的互推与融通,是“一带一路”承载的历史使命。因此,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路径,“一带一路”既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也是通向人类梦的康庄大道,在造福世界人民的同时,也必将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力量,并提供更多机遇。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是各个民族、国家实现自身利益的机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权利。中国梦当然首先是中国人民的梦,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一带一路”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其实质上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在一个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的环境之中,中国梦才能展现应有的魅力与光彩。其二,在全球化背景下,由资本主导的“全球的全面生产”,尽管日益暴露出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但仍然是推动历史前行不可缺少的动力,其局限性的克服,将展现出“全球的全面生产”的一种新景象。因而,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世界历史及其发展趋势、动力和机制,既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道路之于实现中国梦的重大意义,也有助于我们创造性开拓中国梦实现的新路径:勇敢地走进世界市场,在世界市场的大风大浪中成长,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为世界经济提供新动能、展示新方向,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其三,在“一带一路”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必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这个原则的核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精神。其中,共商、共建是手段,共享是目的。共享发展,于内是共同富裕,于外是共同发展、一起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拓展了中国的发展空间,更是以中国自身的发展推动沿线各国获得更多、更大的发展机会,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总之,中国梦的全球性建构这一特点,要求

中国梦的解读和话语传播具有世界性、全球性。客观地讲,中国梦的世界形象已由“他者”进行多维度、多视角的建构,这些建构多是合理的,但也有很多非理性的东西,对其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态:一方面指出中国梦使中国经济充满了活力,也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发展;但另一方面又怀疑实现中国梦后的中国是否会继续保持和平发展的战略路径。因此,这种由“他者”建构中国梦国际形象的局面亟待改变。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进行跨文化传播,在世界历史和“新天下观”的宏大视野中,以“人的类存在”思维和全球性视野对中国梦进行阐释,讲清楚中国梦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价值逻辑,清晰地呈现出中国梦的价值理想,让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民,对中国梦的家国情怀和天下情怀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达到理解、认同的目的,并进而为中国梦的全球性建构提供坚实的价值观基础。

#### 注释

①白彤东称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为具有先驱性的天下体系。参见白彤东:《谁之天下?——对赵汀阳天下体

系的评估》,《社会科学家》2018年第12期。②康有为著,姜义华、张荣华等编:《康有为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③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写:《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55—394、253—254页。④赵旭东:《迈向和而不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一带一路”人类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的新思考》,《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⑤范玉刚:《“一带一路”战略的文化维度及其区域文化空间塑造》,《人文杂志》2016年第3期。⑥王继华:《文化强国战略的哲学意境》,《文汇报》2012年3月12日。

#### 参考文献

- [1]赵汀阳.天下观与新天下体系[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2):70.
- [2]高德步.中国价值[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 [3]孙希旦.礼记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582.
-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5]沈清松.跨文化哲学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48.
- [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The Belt and Road”: The “Dream Building Road” of Chinese Culture Going Out

Zhang Sanyuan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not only carrie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but also carries the glory and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a realistic extension of the value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and a bridge connecting the Chinese dream and the world dream. Chinese culture can only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itself while enhancing it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by going out, thereby demonstrating the connection and synergy between the Chinese dream and the beautiful dream of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and bette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Going out means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also known as “cultural extrapolation”. “The Belt and Road” is not only a road of economic exchange, but also a road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The Belt and Road” carries and spreads the contemporary values and ideals of Chinese culture, constantly explores cultural space production, and embodies the organic unity of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 strategy of cultural power not only means building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but also means effectively spreading Chinese culture. Only through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an Chinese culture achieve global construction in multiculturalism, creating a harmonious and symbiotic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providing strong endogenous impetu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Chinese culture; cultural extrapol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dream building road

[责任编辑/周 舟]